解放軍空軍戰略之發展與演變*

唐 仁 俊

(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 要

解放軍空軍建軍最初的數 10 年，其空軍戰略係以支援陸軍為主，解放軍空軍未來戰略構想發生劇變，係肇因於 1985 年鄧小平提出「戰略決策」；該決策要求軍方從準備遂行「早打、大打、打核戰」改為遂行「局部戰爭」。這些改變包括撰寫新教材、研究攻防兼備的能力以及研析戰役與戰略理論等。1987 年王海提出「攻防兼備」的構想，卻未受到公開的矚目。波灣戰爭以後，解放軍空軍了解到其軍事科技的落後，及空軍作戰訓練準則已不適用於現代戰爭，這使得本身面臨了空軍戰略調整的壓力。1999 年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劉順堯開始強調攻勢作戰的必要性，並宣佈「攻防兼備」空軍戰略，以建立打一場「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軍事能力。

關鍵詞：攻防兼備、國土防空、人民戰爭、局部戰爭、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 * *

壹、前 言

在 1999 年 11 月 11 日，解放軍空軍慶祝建軍 50 週年紀念大會前夕，司令員劉順堯與政委喬清晨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正式明確指出：「中國空軍在新時期軍事戰略任務，將由消極被動的『防空型』向主動積極的『攻防兼備型』轉變，空軍的作戰任務在聯合戰役中，將從配屬陸軍的『從屬關係』角色調整到平等『夥伴關係』，在加強作好防空任務的既有基礎上，突出加強空中進攻力量的份量，以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①

解放軍空軍此一戰略的改變，無疑加深了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就地緣環境分析，中共武力犯台成功的先決條件在制空權的取得，在高技術局部戰爭的軍事戰略指導

---

* 在此筆者要感謝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林文程教授，國防大學戰爭學院副教授張延廷上校及國防大學空軍學院教官黃學明上校在撰寫本論文期間給予筆者的協助。

註① 張農科，「向攻防兼備型轉變——訪空軍司令員劉順堯中將、政委喬清晨中將」，**紫荊雜誌**（香港），總第 109 期（1999 年 11 月 5 日），頁 5~9。

下，解放軍空軍勢必是台灣國防安全的最大威脅，解放軍空軍的發展奠基於空軍戰略的理論基礎。面對中共強大的軍事威脅，進一步透視解放軍空軍戰略的發展有其必要。孫子有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基於此，引發筆者對解放軍空軍戰略的發展進行深入研究的動機。

本文雖以解放軍空軍戰略爲主要研究核心，然而由於解放軍空軍戰略的發展與演變，主要依循本身國家戰略與軍事戰略的指導。因此，本文首先將對國家戰略、軍事戰略及空軍戰略相關概念作界定，以作爲分析解放軍空軍戰略之視角。其次以國內外環境作爲分析的背景，對各時期解放軍空軍戰略作有系統的回顧。最後對當前中共「攻防兼備」之空軍戰略作探討，期能呈現客觀及具建設性的研究成果，以提供我空軍在制定軍事戰略及空軍戰略上的參考。

貳、國家戰略、軍事戰略、空軍戰略相關概念界定

一、國家戰略與軍事戰略

在西方，戰略與戰術一樣曾被視爲純屬「軍事領域」的問題。這樣的看法一直延續到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戰爭問題複雜化，政治、經濟、科技和精神等因素對戰爭的影響越來越大，從而打破了戰爭問題上的許多傳統看法，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戰略問題。並有別於傳統純屬軍事領域的意義及內涵，而更廣泛的包含了除了軍事以外足以影響國家發展的所有因素。以我國爲例，包括政、軍、經、心四項，被泛稱爲「國家戰略」(National Strategy)，而中共則將其定義爲：「籌劃和指導國家各個領域以謀求安全和發展的方針、政策。由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等諸領域的戰略組成。」②其意義及內涵與以「軍事領域」爲核心之「傳統戰略」有極大的差異。

國家戰略這一概念是美國人首先提出，而其直接傳承之母體則是英國人所提出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概念。英國戰略家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於 1929 年首先提出了凌駕傳統戰略——「軍事戰略」之上的大戰略概念。之後，英國軍方所出版的《野戰條令》採納了大戰略概念，其定義爲：「爲了實現國家目標而最有效地發揮國家全部力量的藝術。它包括採取外交措施，施加經濟壓力，與盟國締結有利的條約，動員全國的工業和分配現有的人力，以及使用陸海空軍進行協同作戰。」③

美國人不僅從英國引進了大戰略的概念，並且另外還創造了國家戰略這一新概念，作爲官方正式用語，國家戰略從 50 年代起在美國廣泛流行。根據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1953 年再版的**美國聯合軍語詞典**（*Dictionary of U.S. Military Terms for Joint*

註②　鄭文翰，**軍事辭海**（軍事綜合卷第一卷）（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7。

註③　吳春秋，「淺談大戰略和國家戰略」，**世界知識**（北京），第 12 期（1984 年 12 月），頁 2。

Usage）對於國家戰略所下的定義為：「在平時和戰時，發展和使用國家的政治、經濟、心理權力，連同其武裝部隊，以確實達到國家目標的藝術和科學。」到了 1979 年，美國國防部所出版的**軍事及有關名詞辭典**（*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又作了比較簡明的定義：「在平時和戰時，發展和應用政治、經濟、心理、軍事權力以達到國家目標的藝術和科學。」④

除了美國對「國家戰略」提出相關論述外，1960 年代中期，法國將軍戰略家薄富爾（Andre Beaufre）也在 1965 年所出版的**戰略緒論**（*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一書中提出總體戰略（Total Strategy），企圖更周全的解釋大戰略及國家戰略之國家層級的戰略概念。他認為：「總體戰略是位在金字塔的頂上，而且也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其任務為決定總體戰爭應如何指導。」⑤

以上三種有關國家戰略之名詞及定義，其內涵並無不同，只是提出的時間及所代表的名詞有所差別。我國戰略研究先驅鈕先鍾也提出同樣的論點，他指出：「在現代戰略思想的範疇中，戰略、大戰略、國家戰略、總體戰略這些名詞是名異實同，所代表的實為同一種觀念，只不過是因為使用的時代，國別以及個人的好惡有所不同，所以就造成了幾種名詞同時並用的現象。」⑥

至於「軍事戰略」其意義與傳統戰略所指的意涵相同，是以「軍事領域」為其核心，相對國家戰略而言則歸屬於其內涵之一。美國國防部 2006 年所出版的**軍事及有關名詞辭典**對軍事戰略的定義為：「一個國家運用武裝部隊之武力或武力威脅，鞏固國家政策目標之藝術與科學。」⑦中共則定義為：「戰略指導者基於對軍事鬥爭賴以進行的主客觀條件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認識，全面計畫、部署、指導軍事力量的建設和運用，以保證有效地達成既定的政治目的。」⑧

二、空軍戰略

自從 1903 年萊特兄弟（Wilbur Wright, 1867-1912 年／Orville Wright, 1871-1948 年）發明飛機後，空中隱然成為戰爭另一個軍事爭奪的新據點，如何取得空中控制權，以達到掌控戰爭制高點的軍事思維，成為軍事戰略學家所思考的核心問題，即使如此，空中武力的軍事運用在初期是建立在陸、海軍的思維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實戰經驗及教訓使得世界各國體會到空中力量在戰爭中的戰略價值。1918 年 4 月 1 日，英國率先成立獨立空軍，確立空軍與陸、海軍平行之軍事地位，脫離空中武力附屬於陸、海軍作戰之傳統思維，為空軍戰略的發展奠定實踐面的基礎。1921 年，義大利人杜黑（Giulio Douhet）所著之**制空權**（*The Command of the Air*）出版，則更開啓了空軍

註④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年），頁 30；有關國家戰略的說法亦可參考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pril 12, 2001, as Amended through April 14, 2006）, p. 362.

註⑤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頁 34。

註⑥ 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台北：黎明出版社，1985 年），頁 220~221。

註⑦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p. 341.

註⑧ 王文榮主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8。

戰略在理論面的論述，至此隨著各國獨立空軍的成立，空軍戰略的制定成爲各國空軍發展的主要依據及基礎。

何謂空軍戰略，根據中共軍方所出版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手冊—空軍分冊**的定義爲：「空軍戰略是指導空軍作戰和建設的方略。它從屬於國家軍事戰略，是軍事戰略在空軍的具體運用。軍事戰略規定空軍戰略的性質，要達到的目標和任務；空軍戰略根據軍事戰略的要求，結合空軍的實際制定總體決策，充實軍事戰略。空軍戰略是空軍軍事學術的組成部分和最高層次，指導空軍戰役法和空軍戰術。」⑨

我國**國軍軍語詞典**的定義則爲：「空軍戰略爲建立空軍兵力，藉以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以支持軍事戰略之藝術，俾得在爭取戰役目標或從事決戰時，能獲得最大之成功公算與有利之效果。」⑩

綜合以上兩方的定義，大致可歸納出，空軍戰略是建立及規劃空軍發展及作戰的指導，藉以使之獲致最大空中力量之效果，以達到對上支持軍事戰略，對下指導空軍戰役、戰術之目的。

三、國家戰略、軍事戰略與空軍戰略的關係

從上文對國家戰略、軍事戰略及空軍戰略的定義，可以了解到，三者間是屬於上下隸屬的指導及被指導關係，其三者關係如圖一所示。

三者間以國家戰略位階最高，屬國家層級，其所指導領域除軍事戰略外，還包括政治戰略、經濟戰略、心理戰略，其區分項目，每個國家各有不同，美國官方對國家戰略做四個區分，也就是我國現在所習用的政治、經濟、軍事及心理四項。⑪我國也以此做分類，固本文採取此種區分方式。

因此就國家戰略的位階而言，所謂國家戰略中的國家，是指此種戰略超越軍事範圍，並把非軍事因素包括在內，所以，是在國家政府全面指導之下。換言之，也就是國家階層的戰略，包括所有各種不同權力的運用在內。對於軍事之外的其他國家權力也是一樣，軍事、政治、經濟、心理等戰略都包括在國家戰略之內並受其指導。⑫

在軍事戰略方面，是國家戰略的組成部分之一，與政治、經濟、心理等戰略屬平行關係，受國家戰略的指導，正如我國國防部出版**國軍軍語辭典**對軍事戰略的定義：「軍事戰略爲國家戰略之一部分，亦爲各軍種戰略之統合運用，乃建立與運用國家武力之科學與藝術，配合政治、經濟、心理諸戰略，構成國家戰略，以達成國家目標。」⑬又說：「軍事戰略爲建立武力，藉以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以支持國家戰略之藝術，俾得在爭取軍事目標時，能獲得最大之成功公算與有利之效果。」⑭

至於空軍戰略可說是三者中層級最低的，受制於軍事戰略的指導，兩者間之上下

註⑨　辛明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手冊—空軍分冊**（青島：青島出版社，1991 年），頁 154。

註⑩　國防部編，**國軍軍語辭典**（台北：國防部，2000 年），頁 2~5。

註⑪　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頁 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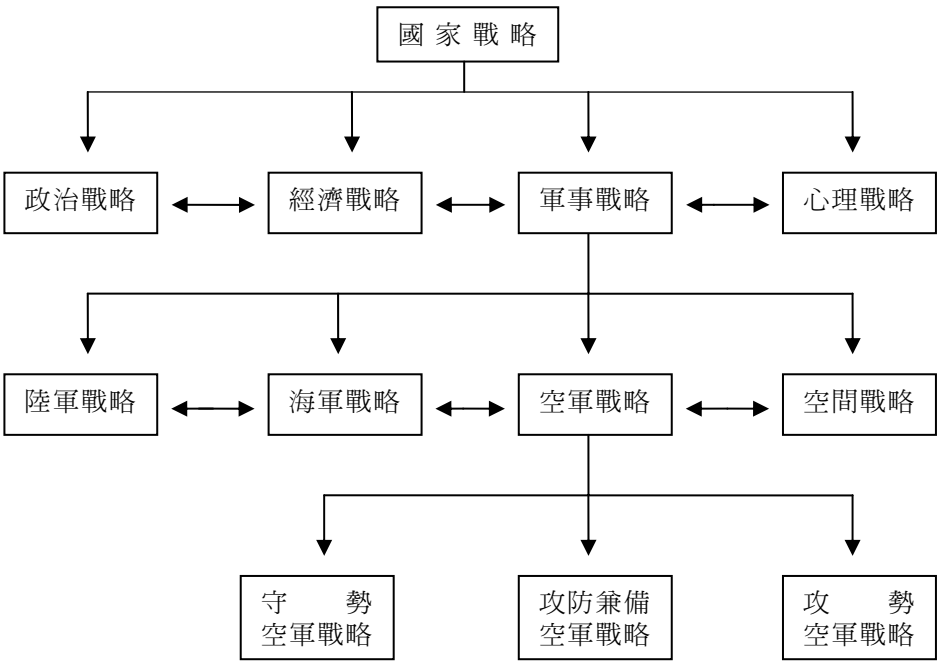
註⑫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頁 32~33。

註⑬　國防部編，**國軍軍語辭典**（台北：國防部，1973 年），頁 5。

註⑭　國防部編，**國軍軍語辭典**（台北：國防部，2000 年），頁 2~5。

關係可由我國**國軍軍語詞典**的定義得到答案：「空軍戰略爲建立空軍兵力，藉以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以支持軍事戰略之藝術，俾得在爭取戰役目標或從事決戰時，能獲得最大之成功公算與有利之效果。」⑮此外，根據中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空軍大辭典**的定義：「空軍戰略是空軍建設和作戰全局的籌創與指導的方略，從屬於國家軍事戰略。」⑯其定義也指出軍事戰略與空軍戰略的主從關係。

圖一　國家戰略、軍事戰略與空軍戰略的關係圖



資料來源：上海辭書出版社編，**空軍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 年），頁 6；國防部編，**國軍軍語辭典**（台北：國防部，2000 年），頁 2~5；辛明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手冊—空軍分冊**（青島：青島出版社，1991 年），頁 154；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年），頁 32~33。

叁、解放軍空軍戰略演變與回顧

本節將對解放軍空軍戰略的演變作回顧分析，並以中共當時所面臨之「國內外環境」作爲分析國家戰略、軍事戰略的主要視角，以此來探討解放軍空軍戰略的轉變。

註⑮　同前註。

註⑯　上海辭書出版社編，**空軍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 年），頁 6。

一、人民戰爭時期的空軍戰略──國土防空（1949-1978 年）

（一）國際因素

在二次大戰戰後，美蘇所形成之兩極冷戰體系，深深影響中共的對外關係，身處兩極對抗的國際環境下，中共對外關係主要圍繞在與美蘇兩國關係的變化上，其最重要的戰略盤算，就是如何聯合兩大強權的一方來對抗另一方，以尋求本身的安全。⑰

因此，中共不論是一面倒向蘇聯、反美反蘇或者聯美反蘇，都面臨與一個或兩個當時國際間最強的國家爲敵，因而戰火發生於中國境內的可能性很大，毛澤東對當時國際情勢的看法，認爲中共與美國或者蘇聯終將一戰。因而堅信中國必須爲「早打、大打」作好準備。⑱在此思維下，「人民戰爭」誘敵深入的戰略思維，提供了最佳的軍事戰略論述。毛澤東認爲，「人民戰爭」理念是在對付比自己強的敵人時，最佳的戰略依據，一如以往共產黨在面臨國民黨及抗日戰爭時的情況般，在面臨美蘇軍事威脅，解放軍所必須採取的步驟策略：首先必須「誘敵深入」，然後是對敵人採取持久戰與消耗戰。根據毛澤東的想法，一個筋疲力盡的敵人將會被「人民戰爭」的人海戰術所拖住，然後會在戰略反擊之下被迫撤退。⑲

（二）國內因素

中共至 1976 年毛澤東死亡爲止，內部一直以意識形態治國，在這個階段中，毛澤東發動許多政治運動如「土改」、「三反」、「五反」、「反右鬥爭」、「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等，以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和制度與剷除實現其政治目標的阻力。⑳藉由幾次的政治鬥爭，更加穩固了毛澤東不可挑戰的神格地位，在經歷了國共、抗日各項戰爭的經驗，「人民戰爭」一直是中共的軍事戰略核心，具有一定的歷史貢獻，幾乎與毛澤東畫上等號，原本屬於軍事專業的議題，因爲內部政治鬥爭的日益升高，隱然形成推翻「人民戰爭」軍事戰略，既是等同於挑戰毛澤東黨內地位的政治氣氛。雖然仍有一些將領提出調整「人民戰爭」軍事戰略的構想，然而最後並未能成功。

例如韓戰結束後，有鑒於美軍在韓戰中所展現出現代化武器的優勢，以彭德懷爲首的軍事將領曾提出軍事現代化的構想，然而 1957 年後，由於在軍隊中開展了「反對教條主義」，「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反右傾」運動，打擊了這一批致力於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軍隊領導人。㉑此外，50 年代末期，葉劍英試著改寫解放軍的準

註⑰　唐仁俊，「中共對信心建立措施之立場、實踐經驗與策略運用」，**中國大陸研究**，第 47 卷第 1 期（2004 年 3 月），頁 109。

註⑱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 年），頁 113。

註⑲　Paul H. B. Godwin, “The PLA Face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Doctrine,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James Lilley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a's Military Faces the Future*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ess, 1999), p. 44.

註⑳　吳安家主編，**中共政權四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5 年），頁 14。

註㉑　秦耀祁主編，**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概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 年），頁 34。

則以便適應新的武器裝備，他提倡的是「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但是葉劍英的建議卻沒有獲得主事者的背書；相反地，解放軍更加涉入國內的政治鬥爭，特別是 1966 至 1976 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解放軍原本要做的一些改革根本沒有付諸實行。㉒

另外一次論戰則發生在 1971 年年中，在「電子與鋼鐵」何種重要的爭論中，陸軍主張擁有更多「鋼鐵」，而空軍與核武部隊則主張對高科技（也就是電子）作出更多的投資。此次論戰中，中共國家安全規劃階層分爲兩派。主張發展「電子」的一方，以國防部長林彪爲首。他們認爲美國是中共主要威脅，所以必須擁有更強大的空軍及核子嚇阻能力。主張發展「鋼鐵」的一派則由總理周恩來所領導。這派人認爲蘇聯才是主要的敵人；因此主張強化戰車師和陸軍部隊的戰力。最後由支持發展「鋼鐵」的主張勝出，因爲這比較符合毛澤東本人的戰略評估。㉓

從以上的事件可知毛澤東在中共內部不可挑戰之神格地位，是導致中共軍事戰略在面臨內外部變化時，仍不改「人民戰爭」爲核心的軍事思維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政治掛帥的政治氣氛與毛澤東的因素外，計畫經濟爲主的經濟模式，也給了「人民戰爭」軍事戰略有利的客觀環境，主要原因在於，中共推行計畫經濟，降低了中共與外界經濟互動的重要性，當發生大規模入侵戰爭時，沿海省份作爲「人民戰爭」中「誘敵深入」區域的軍事思維，是可以被接受的。

中共在人民戰爭守勢軍事戰略的主導下，促使一切軍事作爲以陸軍作戰爲核心，空軍的存在是依附在陸軍的戰略思維上，雖然因應世界潮流，中共成立獨立空軍。然而，事實上，空軍只是一支輔助陸軍打贏戰爭的戰術支援軍種，其任務僅止於對地面兵力的支援。㉔中共之所以將空軍定位爲附屬陸軍之戰術支援軍種，主要是受到人民戰爭軍事戰略總體思維的影響。陸軍成爲中共因應強權入侵的主力兵種，使得解放軍空軍建軍後數十年間所研擬之理論與作戰模式，係以支持陸軍需求爲主。

此外，另一個影響空軍戰略的因素爲，解放軍空軍建立初期的成員組成份子幾乎來自陸軍。依資料顯示，解放軍空軍 5500 名建軍元老中，只有 29 名具有航空背景，其餘的空軍兵力皆來自陸軍。㉕這使得解放軍空軍在制定戰略戰術時，以陸戰理論經驗爲核心，雖然空軍作戰在作戰藝術上和戰術範圍內與陸軍有若干的差別，然而在人民戰爭軍事戰略時期，解放軍空軍以陸軍的戰術經驗、戰術原則爲基礎，是毫無疑問的，㉖以此達到支持陸軍執行本土防衛之「國土防空」的軍事任務。

註㉒ Paul H. B. Godwin, “The PLA Face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Doctrine,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p. 43.

註㉓ 轉引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現代化中共軍力**（台北：史政編譯局，2004 年），頁 349。

註㉔ 楊中美，「中共空軍戰略方針的演變形成」，**中共研究**，第 34 卷第 10 期（2000 年 10 月），頁 98。

註㉕ Kenneth W. Allen, “The PLA Air Force: 1949-2002 Overview and Lessons Learned,” in Laurie Burkitt,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M. Wortze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3）, p. 106.

註㉖ 劉亞樓，「在陸軍的基礎上建設空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空軍回憶史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頁 3。

解放軍空軍首次提出「國土防空」，並將空軍定位爲陸軍附屬軍種，是在 1950 年 12 月空軍召開的機務工作會議上。在會議中，解放軍空軍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的思想。1951 年 2 月召開的空軍黨委第一次擴大會議上，經過集體討論，正式確立了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這一方針。它包括：「空軍建設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爲指針；在基本制度方面，必須以中共人民解放軍的建軍、作戰方針原則、制度和優良傳統爲基礎，貫徹黨委制、堅持集體領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充分發揮政治工作的保證作用等。」同年，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在**人民空軍**雜誌上發表了「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以什麼爲建設空軍的基礎這個問題上，必須反對兩種偏向。一種是脫離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而企圖另搞一套，以爲空軍是新軍種，陸軍的建軍原則和經驗不適用，要另起爐灶；另一種是滿足已有的陸軍經驗。這兩種偏向都是錯誤的，都會妨礙人民空軍的建設。」㉗

此外，解放軍空軍「國土防空」之戰略思維，也出現在空軍所出版的戰鬥條令。在 1962 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戰鬥條令**（草案）關於空軍擔任的主要任務中明確規定：「進行奪取制空權的鬥爭，監視重要空域，在重要時節和一定空域奪取和保持制空權，保障我國重要目標和我軍主要集團的戰鬥行動不受敵人有組織的、嚴重的空中襲擊。」在定位空軍角色時則指出：「空軍在與陸、海軍聯合作戰時，應以陸、海軍的勝利爲勝利，以陸、海軍爲主要組織協同動作。」㉘充分顯現出空軍作戰必須隸屬於陸軍作戰之戰略思維。

二、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時期的空軍戰略——攻防兼備醞釀期（1979-1984 年）

（一）國際因素

1979 年，中美蘇三角關係出現變化，隨著中共與美國於 1979 年建交，更加確立自 1972 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中國後，中共聯合美國對抗蘇聯的策略。基於此，蘇聯也作出因應策略，支持越南入侵高棉、入侵阿富汗並於中蘇邊界部署重兵，對中共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脅。更明確的說，「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係爲因應蘇聯可能越過大陸北方邊界發動攻擊所引發的安全挑戰。雖然防止蘇聯入侵正是「人民戰爭」極欲因應的確切威脅；不過，由於在 1970 年末期軍事技術的穩定提升，使蘇聯軍隊的火力擁有前所未有的精準度、射程與摧毀力。這些趨勢的發展使得中共注意到，在爆發衝突的初期階段，蘇聯將有能力發動幾無預警的攻擊，並可運用決定性的優勢火力進行作戰。機械化且射程與精準度均提升的現代武器裝備使得蘇聯部隊能夠迅速集結，並可從陸上、空中與海上同時對中共發動攻擊。最後，具有空前毀滅潛力的現代化武器裝備，特別是核武，也可用以對中共的軍事、經濟、與政治中心發動災難性後果的攻擊。致使中共傳統「人民戰爭」戰略的效力受到嚴重的質疑。㉙

註㉗　王定烈，**當代中國空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年），頁 47。

註㉘　華人杰、曹毅風、陳惠秀主編，**空軍學術思想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頁 315、317。

註㉙　Jencks Harlan,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Wishful Thinking, National Suicide , or Effective Deterr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98（June 1984）, p. 310.

除此之外，1979 年懲越戰爭失利爲中共軍事研究僵化所引發不利後果作了最佳的例證。戰前，中共集中了三比一優勢兵力，擬快速佔領越南在邊境城市，繼而擴大戰果，殲滅越方正規軍，並摧毀越南經濟基地。但因中共軍隊久未作戰、裝備落伍、戰術錯誤、後勤補給不足，加上地形不熟，終而軍事失利。㉚這說明了中共當時的軍事能量，在遠離國境外遂行持久性衝突時，實施兵力投射是極端困難的事。雖然中共人民解放軍入侵越南境內不到 30 英哩，且越南部隊之武器裝備難望其項背：但中共當時對越南實施懲罰性教訓卻付出人員傷亡慘重的代價。㉛這次的教訓使得中共意識到軍事研究僵化明顯的不利後果，也促使中共必須重新檢討軍事武器現代化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要性。

（二）國內因素

此時中國大陸內部正因爲 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的結果，使得社會充斥著一股不安的氣氛，老百姓所得到的代價是「一窮二白」，並產生「三信危機」(信心、信任、信仰)，衝擊到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中國共產黨意識到再不改革將會危及到本身的政權。因此，擺脫了一心追求世界革命的情結。當世界變得日益相互依賴時，尤其是在經濟交流方面，北京的領導人逐漸意識到保持政權的概念具有了新的含義。如今國家安全不僅與政治和戰略問題有關，而且與經濟發展有關。㉜此種思維及認知，於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北京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展現出來。會議中，中共除了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外，並且提出了進行經濟改革的任務和決定，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據此，和平的周邊環境，成爲國家發展的優先前提，周邊如有爭議，必須具備快速控制的軍事能力，快速投射能力的軍隊成爲軍事建設的核心，以往重視人力的軍事戰略思維已不符合此項需求。

此外，毛澤東 1976 年過世，給了軍事戰略探討較爲專業的有利客觀環境。1978 年，中共新領導人鄧小平即開始對「人民戰爭」的觀念提出檢討。中共認爲，由於當時所面對的主要敵人蘇聯的軍事科技已出現快速成長，「人民戰爭」的傳統戰法已不足以對抗蘇聯可能的入侵。因此，鄧小平決定將「人民戰爭」調整爲「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概念，用以因應蘇聯動用現代化武器與科技對中共發動傳統與核子戰爭的威脅。另外，隨著中共在 70 年代末期推動經濟改革，中國大陸已出現新的工業中心，因此必須調整軍事戰略，以在敵軍深入中國領土以前，運用解放軍常規與機械化部隊防止敵人長驅直入，以保護中國大陸工業生產基地。㉝

雖然在「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軍事戰略的思維下，空軍重要性固然獲得提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軍事戰略雖已作了調整，建軍朝武器現代化前進，然而

註㉚ 有關懲越戰爭請參考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台北：幼獅出版社，1996 年）：馬振坤，「從克勞塞維茲戰爭理論剖析中共三次對外戰爭」，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年），頁 1~272。

註㉛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中共軍事現代化**（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8 年 7 月），頁 94。

註㉜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頁 83。

註㉝ Mark Burles and Abram N.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Santa Monica, CA: Rand, 2000）, pp. 26~29.

「人民戰爭」的要素依然不變。蘇聯仍是中共的主要安全威脅，共軍可能仍無法遏阻邊界地區裝備精良的蘇聯軍隊，因此依然需要以持久且代價高昂的消耗戰，方能獲取對抗蘇聯大規模侵略行動的勝利。㉞陸戰仍是中共軍事思維的主軸，即使解放軍空軍具有獨立軍種的地位，然而在陸戰的思維下，空軍仍沒有獲得獨立的戰略地位，一切作爲目的僅在尋求陸戰的勝利，在建軍備戰上仍根據陸戰需求而定，這使得解放軍空軍不管在軟硬體發展上仍受到極大的限制。㉟不過相較於「人民戰爭」時期「國土防空」之空軍戰略，在「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時期，解放軍空軍已開始醞釀「攻防兼備」空軍戰略之能量，對空軍武器現代化出現迫切的需求，並提出一系列現代化的計畫。

1977 年，中共國務院、中央軍委會做出了關於加速我軍武器裝備現代化的決定，要求大力整頓現有裝備，抓好新型武器裝備的研製工作，「六五」期間要大量生產殲-7 型飛機，並生產一定數量的殲-8 型全天候飛機裝備部隊，還要抓好新型飛機的研製生產。從 1985 年到世紀末，要繼續完成前階段尚未完成的任務，全面向新的高度發展，力爭大部分接近、部分趕上和超前世界先進水平，明確要求空軍要提高以戰略要地爲中心的「國土防空」能力，並提高對陸、海作戰的支援能力。㊱

1979 年 1 月 18 日，鄧小平在聽取「原三機部」的匯報時也明確指出：「將來打起仗來，沒有空軍是不行的，沒有制空權是不行的。陸軍需要空軍掩護和支援，海軍沒有空軍的掩護也不行……沒有制空權，敵人的飛機可以橫行無阻。」他還強調：「不管如何，今後作戰，空軍第一。……首先要有強大的空軍，要取得制空權。否則，什麼仗都打不下來。我看今後重點放在發展空軍。如果我們能有一定數量的更高級的飛機，那麼形勢就不一樣了。」㊲

據此，可看出解放軍空軍在軍事的戰略位階已有所提高，然而仍是以達到「國土防空」及「支援陸戰」爲核心。空軍的地位及角色仍不脫「依附陸軍」之戰略思維。以 1980 年代初爲例，在解放軍開始將陸軍組建成集團軍，空軍也被賦予防禦集團軍野戰陣地的任務時。中共軍委會特別指示：「空軍各兵種與部隊必須建立支援陸軍需求的

註㉞　Jencks Harlan,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Wishful Thinking, National Suicide , or Effective Deterrent?” p. 315.

註㉟　廖文中，「中共空軍戰略及武器裝備現代化」，**中共軍事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出版，2001 年 1 月），頁 362。

註㊱　姚峻主編，**中國航空史**（鄭州：大象出版社，1998 年），頁 401。

註㊲　鄧小平，**鄧小平軍事文集第三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153。筆者必須說明的是，鄧小平以領導人的身分提出重視空軍的看法並非中共建國以來首次，以往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也曾多次提及空軍的重要性。如中共在建國初期，受到韓戰影響，毛澤東就曾多次提出空軍的整建計畫，嘗試建立一支強大的空軍。然而在面臨美蘇（前期的美國及後期的蘇聯）核武及軍事入侵的威脅下，正如前文所分析，以國土防衛之「人民戰爭」軍事戰略成爲中共軍事建設的主要思維，據此，中共將軍事資源優先投入於「三線」建設及核武器的發展上，導致排擠到空軍建設的進程，之後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的影響，空軍的整建計畫並未成功。有關中共空軍現代化所面臨的限制可參考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s Search for a Modern Air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Summer 1999）, pp. 64~94.

信念，並且勝利是屬於陸軍的。」㊳以此可知，在此時期，解放軍空軍戰略仍不脫「依附陸軍」之「國土防空」的戰略思維。然而，在強調軍事現代化的同時，解放軍空軍在「國土防空」的戰略基礎上，正開始醞釀「攻防兼備」的能量，朝「攻防兼備」空軍戰略的方向前進。

三、局部戰爭時期的空軍戰略——攻防兼備討論期（1985-1992 年）

（一）國際因素

國際環境在 1985 年出現了極大的變化，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爲了致力於蘇聯內部的改革，提出與西方和解的「新思維」政策。雖然冷戰仍未結束，然而兩極對抗的國際局勢已趨於緩和。軍事的主導性下降，經濟議題及安全合作的呼聲日益高漲，這種國際氣氛也影響到中蘇兩國關係的發展。戈巴契夫上台後，中共與蘇聯之雙方談判有了更進一步的進展。㊴

中共與蘇聯在此階段逐步走向和解，其目的大致可歸納爲以下三點：㊵

1.利用中蘇共和解，蘇聯撤出中蘇邊界大部分駐軍的時機，一方面可減輕來自北方邊界的威脅；另一方面可與蘇聯進行經貿與科技合作，爭取獲得蘇聯在軍事與技術上的協助，以加速其「四個現代化」建設。

2.藉著與蘇聯重建關係之際，利用蘇聯對印度、越南等不友好國家施加壓力，藉以減緩來自西南與南方的威脅，進而擴大中共在亞洲區域的影響力。

3.標榜其現階段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具體化表現。意即在三角關係中，中共係採取「全方位」的外交模式，以求得在美、蘇兩強中一個平衡的地位，並可避免美、蘇兩強任何一方的威脅與利用，藉此從中謀求本身的最大利益。

在此戰略考量下，鄧小平在中、蘇共關係正常化的談判中，提出三個條件，蘇聯軍隊自阿富汗和外蒙撤兵，及越南軍隊從柬普寨撤兵，並得到了蘇聯方面的善意回應，戈巴契夫在 1986 年時保證開始自外蒙與阿富汗撤兵。1987 年，有 1 萬 2 千名士兵從外蒙返回蘇聯。當戈巴契夫在 1989 年 5 月到達北京的那一天，四分之三的軍隊已經撤出。蘇聯在阿富汗的軍隊，於 1989 年上半，便已經完全撤退。20 多年來雙方邊界的緊張狀態，也在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於 1990 年訪問莫斯科之後進一步獲得舒緩。㊶

（二）國內因素

註㊳ Kenneth W. Allen, “The PLA Air Force: 1949-2002 Overview and Lessons Learned,” p. 106.

註㊴ 唐仁俊，「中共對信心建立措施之立場、實踐經驗與策略運用」，頁 111。

註㊵ 黃天中、潘錫堂，**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五南書局，1993 年），頁 139~140。

註㊶ 石之瑜，**中共外交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書局，1994 年），頁 128。

1978 年開始的經濟改革，至 1985 年止，在農村的承包制獲得很大的成功，經濟改革政策的繼續深化，乃爲中共下一步國家發展的核心，這也直接影響到中共領導人對世界的情勢判斷。鄧小平在 1985 年 3 月 4 日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說到：「現在世界上眞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㊷爲了因應所認知到的國際環境的變化，鄧小平於同年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裁軍百萬，並改變毛澤東對世界主要特徵爲「戰爭與革命」的看法，將其調整爲「和平與發展」，將「早打、大打、打核戰」之「人民戰爭」改爲打一場「局部戰爭」的軍事戰略。於 1988 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正式以「局部戰爭」取代「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成爲中共新時期的軍事戰略。㊸

基於軍事戰略的轉變，解放軍不但須要執行大陸型防禦工作，而且也要保護中國大陸廣大的海洋主權。這麼巨大的轉變使得解放軍必須重新調整它的作戰準則，賦予海空軍新的使命，並放棄「人民戰爭」的中心思維。㊹在「局部戰爭」軍事戰略的思維下，如何快速控制陸疆及海疆，避免戰爭轉變爲曠日費時的持久戰成爲軍事行動的主要核心，因此未來的作戰模式須要能「快速反應」並具「投射能力」之作戰部隊。

在此思維下，解放軍空軍未來戰略構想發生變化，這些轉變包括撰寫新教材、研究攻防兼備的能力，以及研析戰役與戰略理論等。㊺解放軍空軍理論分成戰略、戰役、戰術三種層級。綜觀歷史，空軍係根據自身作戰經驗和蘇聯準則，逐步發展戰役與戰術理論及各種相關規定，唯戰略理論仍付之闕如。「局部戰爭」的思維下，空軍的戰略理論開始有了需求。1985 年王海上任空軍司令員後，開始對空軍戰略理論賦予新的生命。並開始對於將「國土防空」型的空軍戰略調整爲「攻防兼備」的議題提出討論。王海爲解放軍空軍第一位空軍出身的司令員，在此之前，解放軍空軍司令員皆由陸軍出身的將領所擔任。

1986 年 6 月，王海在向陸、海、空三軍幹部作題爲「現代合同戰役中的空軍作戰使用」之報告中，首先提出空軍在合同戰役中的獨立性，企圖擺脫以往空軍「以陸軍勝利爲勝利」之依附性，他指出：「樹立立體的合同作戰觀念，重視研究空軍在合同戰役中的作戰使用，使空軍作戰和地面軍隊作戰有機結合起來，密切協同，形成整體的作戰系統，充分發揮整體威力，是現代合同戰役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同時並強調：「合同戰役中，空軍的作戰行動應服從合同戰役的全局需要，以合同戰役的勝利爲勝利。」㊻

1987 年王海在國防大學向三軍幹部講課時，正式提出最接近戰略構想的主張，特

註㊷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頁 104。

註㊸　丁樹範，「中共精簡軍隊內容、性質、未來」，**中國大陸研究**，第 35 卷第 9 期（1992 年 9 月），頁 56；Dennis J. Blasko, "Chinese Army Modernization: An Overview," *Military Review*, vol. 85,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 68.

註㊹　Paul H. B. Godwin, "The PLA Face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Doctrine,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p. 48.

註㊺　Kenneth W. Allen, "The PLA Air Force: 1949-2002 Overview and Lessons Learned," p. 107.

註㊻　華人杰、曹毅風、陳惠秀主編，**空軍學術思想史**，頁 317~318。

別呼籲空軍「由國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的戰略轉變。」他強調：「現代合同戰役中，爲了發揮空軍機動速度快，打擊距離遠、殺傷面積大、破壞能力強和能有效進行信息鬥爭和電子鬥爭等特性，應把空軍作爲與敵爭奪制空權的主要力量，保證我軍重要作戰行動不受敵空襲的嚴重危害；作爲打擊敵戰役縱深的主要力量，削弱敵軍的進攻銳勢和防禦韌性……。也就是說，空軍既要能奪取制空權，保衛要地和地面軍隊的主要部署不受或少受敵人的空中威脅，又要具有一定的戰役進攻能力，特別是突擊敵人戰役縱深目標的能力，以保障合同戰役的勝利。」㊼

在「局部戰爭」軍事戰略的指導下，王海有關空軍戰略的相關主張，引起解放軍空軍內部對「國土防空」空軍戰略的適用性產生質疑，並開始對「攻防兼備」空軍戰略及其理論進行討論。然而，空軍內部各方的觀點仍是十分紛歧，因此未有明確的定論。主要在於，即使在局部戰爭軍事戰略的指導下，快速反應及投射能力的強調，本應是解放軍空軍戰略重新定位的契機。然而，此時期解放軍空軍戰略無論在客觀理論或主觀理論，仍均侷限於「積極防禦」的框架中，以至於只在「有限空間」之內與入侵之敵進行反鬥爭之研究，即所謂「防禦性防空論」(主要論點包括「快速反應戰略」、「整體縱深打擊戰略」、「有限空間靈活反應戰略」等)，這些戰略論點均只侷限於「積極防空、重點支援」、「重點防空、積極支援」、「重點防空、重點支援」、「積極防禦、有限反擊」、「積極防禦、靈活反應」和「有限威懾、積極打擊」等論點。解放軍空軍實際上並未脫離「國土防空」和配屬陸軍進行聯合戰役之軍事思維。㊽因此，雖然王海早在 1987 年即提出「攻防兼備」構想，卻一直未受到公開矚目，直到 1996 年底，中央軍委會主席江澤民及新任空軍司令員劉順堯等高層才開始強調攻勢作戰的必要性。㊾

綜合以上所言，在冷戰時期，解放軍空軍戰略隨著軍事戰略的轉變，經歷三個時期的調整，從「國土防空」、「攻防兼備」醞釀時期到「攻防兼備」討論時期，雖然空軍角色及作戰思維已產生變化。然而，基本上在這三個時期，解放軍空軍戰略仍屬於「國土防空」的思維及內容。只不過在「國土防空」的外表下，開始向「攻防兼備」過渡，其理論討論也日益成熟。

肆、當前中共「攻防兼備」的空軍戰略

一、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軍事戰略（1993 年至今）

（一）國際因素

註㊼ 同前註，頁 312。

註㊽ 廖文中，「中共空軍戰略及武器裝備現代化之概況」，**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第 187 期（2000 年 3 月），頁 32。

註㊾ Kenneth W. Allen, “The PLA Air Force: 1949-2002 Overview and Lessons Learned,” p. 108.

1991 年，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兩極化的國際局勢正式崩解，國際局勢走向多極，以往以軍事爲核心的國際議題已逐漸爲經濟所取代，多極多元化的發展快速蔓延。就全球局勢來說，中共的分析家都將國際局勢從兩極化走向多極化視爲正面的發展，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後冷戰的戰略環境，提供中共改善國際體系地位的機會。第二，中共和別的亞洲國家，不再被限制在以美蘇對抗兩極的國際局勢中，北京現在可以自由的依照本身的意願，建立各種外交及經貿關係。第三，冷戰時期在亞洲的超級強國，其軍事及政治的影響力已經消退，所遺留下來的權力眞空，給了中共許多運作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相對於冷戰時期的軍事對立，和平的周邊環境給予中共紓解爲因應軍事威脅的軍事負擔，並提供了一個經濟發展及軍事革新的有利環境。㊿

此外，波灣戰爭爆發後，強調高技術的戰爭思維及戰場管理之作戰形態，深深的震撼了中共軍方人士，其後的軍事事務革命的思潮，對中共領導人的軍事思維更造成強大的衝擊，認定高技術已成爲戰爭勝負的主要關鍵。解放軍開始反省「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並企圖從波灣戰爭中獲得經驗與教訓。解放軍把高技術戰爭加上戰爭的局部性，形成了所謂的「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指導。51

（二）國內因素

進入 90 年代，中共有感於世界經濟互賴性持續增加，國際關係中經濟因素成爲主控變數，再加上綜合國力在國家權力鬥爭中的重要性升高，凡此種種都使北京領導人愈加重視對外貿易關係，在制定外交政策時也特別加重經濟考量。我們可以從中共政要在論及對外關係時，口不離經濟的情況中看出。這當然與後冷戰時代國際關係趨向緩和，各國埋首國內經濟不無密切關係。52

後冷戰時期，世界經濟議題的提升及中共經濟發展的快速成長，使得中共對戰爭有了更新的看法。首先，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當代世界有遠見的政治、軍事家，都把發展科技、繁榮經濟作爲立國之本，把避免戰爭、爭取良好的經濟建設環境作爲戰略基點，軍事競爭籌劃的著眼點已從實戰向嚇阻轉變，從贏得戰爭向遏制戰爭轉變。其次，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是中共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階段，保持長時間的國際和平環境特別是良好的周邊安全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基本保證。第三，現代戰爭，是高技術特徵明顯的局部戰爭，是以科技水平和經濟實力爲後盾的戰爭，是損耗巨大、會爲國家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造成重創的戰爭。53

註㊿　Denny Roy, “Restructuring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eds.,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40.

註51　譚傳毅，「高技術條件下解放軍之作戰指導」，發表於**跨世紀兩岸軍力發展與區域安全學術研討會**（高雄：空軍官校主辦，1999 年），頁 2。

註52　劉德海，「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朝鮮半島政策與日本政策」，**國際關係學報**，第 9 期（1994 年 10 月），頁 120。

註53　越勇民，「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指導原則探討」，**國防大學學報**（北京），總第 114 期（1999 年 2 月），頁 24。

針對此，1993 年 1 月，中共召開軍委擴大會議，重新調整軍事戰略的方針，明確提出「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來」，而主要的作戰方向，第一是東南沿海，第二是南海，第三是中印邊境；發展的重點爲海、空軍，同時提昇陸軍整體作戰能力，增強二炮威懾力量及建立快速反應部隊。⑭在此思維上，1995 年，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會中，確立「兩個轉變」的戰略決策：1.在作戰準備上，由應付一般條件下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科技特別是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變；2.在軍隊建設上，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⑮

二、「攻防兼備」的空軍戰略（1993 年至今）

1920 年代在杜黑等空權理論大師的鼓催下，各國紛紛成立獨立空軍。然而，世界各國的空軍自從作爲獨立軍種成立後，雖大多數稱爲戰略軍種，但實際上都不完全具備戰略運用能力，其遂行的主要作戰任務基本上是戰術性的，以美國爲例，美國空軍成立後，就一直聲稱，可通過戰略轟炸來摧毀敵戰爭潛力，直接贏得戰爭的勝利。但至少在 80 年代以前，這一戰略運用目標始終沒有能實現。

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現代空中力量已今非昔比，其裝備技術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完全具備了戰略運用能力。主要展現在：⑯

（一）是遠程作戰能力有了較大的突破。

（二）是空中突擊能力有了質的飛躍。

（三）是自身防衛和突防能力有了重大的發展。

（四）是情報偵察預警能力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由於具備了上述戰略運用能力，空中力量已發展成一支眞正的戰略力量，其戰略運用在當今國際政治、軍事領域，發揮了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此種軍事發展於 1991 年波灣戰爭正式登場並得到驗證，取代以往以機械化爲核心的作戰模式。在波灣戰爭中，美軍展示重要的高科技武器及裝備，及經由訓練有素的操控所獲得的威力。尤其空軍完全控制了制空權，在戰役扮演關鍵角色，促使中共對其軍事戰略重新思考評估空權在現代戰爭中應具備的角色。⑰

如中共軍委會前副主席劉華清曾明確指出：「現代空軍可以進行獨立的、大規模的、不間斷的、長時間的戰略空襲作戰，空中作戰的地位將更爲重要。」⑱前軍委會主席江澤民更於 1992 年 11 月 21 日，當他在視察空軍部隊時親筆題詞：「建設強大的現

註⑭ 國防部編，**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2000 年 8 月），頁 28~29。

註⑮ 蕭占中主編，**現代軍人素質全書**（北京：九州圖書，1999 年），頁 55。

註⑯ 陳新能，「空中力量的未來角色」，**中共戰略與戰術研究專輯**（台北：國防部，1998 年），頁 403~404。

註⑰ Kenneth W. Allen, Glenn Krumel and Jonathan D. Pollack, *China's Air Force Enters the 21st Century*（Santa Monica, CA: Rand, 1995）, p. 31.

註⑱ 天風，「中共空軍加強遠程戰力—空軍要在戰爭中擔『主角』獨立完成任務」，**廣角鏡月刊**（香港），總第 334 期（2000 年 7 月），頁 40。

代化人民空軍，保衛國家領空。」對新時期的空軍建設提出了要求。⑲要空軍須有「當主角」的心理準備，在戰役中空軍須「首當其衝，全程使用」，並能進行「相對獨立」的空中戰役。對於解放軍空軍來說，一貫注重的是防空作戰，對空中進攻，尤其對大規模、長時間的獨立空中進攻戰役，無論作戰理論、武器裝備或是部隊結構與教育訓練，均是史無前例。

在此思維下，解放軍空軍開始修正空軍作戰理論，強調由注重防空作戰向注重空中進攻轉變。即使進行防禦性的防空作戰，依靠傳統的攔截和空戰手段奪取和保持制空權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只有實施快速有效的空中進攻作戰，突擊敵方機場和壓制敵地面防空兵器的進攻作戰，才能轉被動爲主動，奪取和掌握制空權。⑳

1996 年 12 月，解放軍空軍進行領導人事大調整，在江澤民、張萬年、遲浩田的主導下，指定空軍副司令員劉順堯接任第 8 任空軍司令員，此舉標示著將空軍往「攻防兼備」轉變的決心。劉上任後，除了抓整頓空軍軍紀和飛行訓練外，隨即展開解放軍空軍戰略定性的討論。1997 年初，解放軍空軍戰略部門邀請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空軍指揮學院等部門的有關人員，就空軍的戰略做定性研討，形成溫和、強硬兩派意見。

溫和派提出了「快速反應，整體協調，縱深作戰」的十二字方針。該派空軍戰略雖考慮到現代高科技空戰的若干特點，但仍未能擺脫解放軍空軍國土防空與積極防禦的老思維框框。強硬派則根據美軍空地一體作戰理論和蘇聯戰區戰略性戰役理論，以及美軍波灣戰爭中空軍主導作用的事實，強調空軍具有獨立遂行戰略、戰役任務的能力。因此他們提出「積極進攻，首當其衝，全程使用」的新十二字方針，兩派意見匯報給空軍領導層，解放軍空軍領導層也分成兩派。以空軍政委丁文昌爲首的韓戰出身將領認爲溫和派的十二字方針符合中國的國情和解放軍空軍的現狀。而劉順堯、吳光宇等傾向支持強硬派的十二字方針。兩派的戰略分歧報告給中共中央軍委會後，幾經研討、未能定論。㉑

科索沃戰爭的發生，則發揮了爲空軍戰略「攻防兼備」定性臨門一腳的功效。1999 年 5 月，中共中央軍委領導層和解放軍空軍從科索沃戰爭中獲得啓示，即認爲這是繼 1991 年波灣戰爭以來美軍主導的又一場更新的高科技局部戰爭，更是第一場以空軍開始最後以空軍結束，完全由空軍主宰戰場勝負的戰爭。它深刻地展現出高科技武器配合空軍的投射力量，在未來不接觸戰爭中除地對地戰術飛彈外，足以擔任首戰即決戰、首戰即夜戰中首戰先勝攻擊主角的事實。受其影響，中共中央軍委會作出最後裁決：空軍要加強空中進攻力量及相應的配套建設，逐步實現由「國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轉變。解放軍空軍戰略也定性爲：「攻防兼備、首當其衝、全程使用，重在主動攻擊的十二字方針。」㉒

註⑲　陸文至，「鯤鵬展翅上九天—人民空軍五十年建設和發展的光輝里程」，**國防**（北京），總第 163 期（1999 年 9 月），頁 44。

註⑳　張治昌，「空中的優勢在進攻」，**解放軍報**（北京），1994 年 10 月 14 日，第 3 版。

註㉑　楊中美，「中共空軍戰略方針的演變形成」，頁 102~103。

註㉒　楊中美，「空軍司令員劉順堯」，**中共研究**，第 35 卷 10 期（2001 年 10 月），頁 119~200。

這項重大的決定，於 1999 年 11 月，在解放軍空軍慶祝建軍 50 週年紀念大會前夕，在司令員劉順堯與政委喬清晨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正式宣佈「攻防兼備」爲其空軍戰略的主張。並在訪問中指出：「中國空軍在新時期軍事戰略任務，將由消極被動的『防空型』向主動積極的『攻防兼備型』轉變，空軍的作戰任務在聯合戰役中，將從配屬陸軍的『從屬關係』角色調整到平等『夥伴關係』，在加強作好防空任務的既有基礎上，突出加強空中進攻力量的份量，以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⑬此外，他也強調：「一旦戰爭降臨到我們頭上，解放軍空軍在戰略上必須實行攻防結合、注重以進攻手段獲取主動，防空作戰也必須把積極抗擊和有效反擊結合起來。」⑭至此，解放軍空軍正式完成「攻防兼備」空軍戰略之定性工作。

從解放軍空軍各方面的發展顯示出，解放軍空軍確實已脫離以往「國土防空」之戰術空軍，逐步向「攻防兼備」之戰役空軍邁進，此種趨勢不免讓人注意，解放軍空軍目前是否有組建戰略空軍的能力。⑮有媒體曾經指出，軍方消息透露，在 2004 年 5 月，於解放軍空軍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決議中，對解放軍空軍的戰略定位作出三項結論：空軍是由中共領導的國家空軍；要建立空天一體、攻防兼備、資訊火力一體的現代空軍；空軍應是與陸海軍並立，在以空制空、以空制地、以空制海的各種作戰形式中全面參與、能在全空疆作戰、能實施遠程反應的戰略空軍。⑯

以解放軍空軍戰略的演變，「國土防空」在當時整個人民戰爭軍事戰略的指導下，附屬於陸軍，應屬戰術空軍層級。當前「攻防兼備」空軍戰略，則強調「首先使用及全程使用」並強調空軍與其他軍兵種協同作戰的同時，亦能發揮其應有的獨立性，屬戰役空軍層級；至於戰略空軍應具備「全球作戰、全空域作戰」的能力，以當前世界空軍看，只有美國空軍具備此項能力，至於解放軍空軍，雖然意識到空軍在戰爭中的戰略價值，並已著手規劃戰略空軍作爲空軍建軍的遠程規劃，但是就目前的能量來說空軍尚未具備戰略空軍的能力。正如之前在「國土防空」空軍戰略下討論「攻防兼

註⑬ 張農科，「向攻防兼備型轉變—訪空軍司令員劉順堯中將、政委喬清晨中將」，頁 5~9。

註⑭ 「解放軍加強空中攻擊力」，**蘋果日報**，1999 年 11 月 8 日，第 A18 版。

註⑮ 筆者必須說明的是「戰術」、「戰役」及「戰略」就用兵層級看，是相對性的概念，亦即戰略空軍在作戰用兵時也有其戰術及戰役的運用，以美國空軍爲例，可視爲當前唯一稱得上符合戰略空軍的空中武力，然而其空軍在從事作戰時則仍兼具「戰術」、「戰役」及「戰略」之用兵作爲。而本文所指之戰術、戰役及戰略空軍，是以空軍在軍事層級所擔負的角色及其建構方向。如「戰術空軍」，是把空軍視爲陸、海軍的「附庸」，僅從事支援任務而不賦予獨立作戰角色，此種型態的空軍不具獨立性，任何作戰任務的制定完全是以陸、海軍的勝利爲勝利，解放軍空軍在 90 年代之前即屬此種型態的空軍。「戰役空軍」，係指數百公里的戰役縱深內，空軍在與其他軍兵種協同作戰的同時，亦能發揮其應有的獨立性，此種型態的空軍已具備其獨立性，在作戰任務的制定上，已從空軍本位出發，因此，開始著重與其他軍兵種的協同作戰，然而此類型的空軍仍無法決定戰爭的最終勝負。而「戰略空軍」則是將空軍的角色定位爲具有決定戰爭勝負之戰略價值，最典型的理論建構要屬杜黑在其經典著作**制空權**中，對空軍之戰略性論述，當前唯一稱得上符合戰略空軍的國家只有美國，近年來，美國在對外戰爭中，空軍皆扮演重要的戰略角色，成爲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角色，其中科索沃是最爲典型以空軍開始並以空軍結束的戰爭，最符合戰略空軍的理論假設。

註⑯ 「中國籌建戰略空軍」，**成報**，2004 年 6 月 28 日，http://lib-I.ndu.edu.tw/chinese/introduction_tc/online_tc/online_database.htm，採自國防大學電子資料庫。

備」，戰略空軍的組建，現階段在解放軍空軍內部仍屬討論及理論建構時期，其建軍指導仍以「攻防兼備」空軍戰略爲依據。

伍、結　論

隨著中共國家戰略從以往政治掛帥轉向經濟發展及受到波灣戰爭的影響後，軍事戰略也隨之改變，「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爲當前中共的軍事戰略，有別於以往「人民戰爭」所強調之誘敵深入，及以時間換取空間的守勢戰略，「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強調投射能力及快速機動力的展現。在此指導下，解放軍空軍戰略面臨轉型，以往服膺於「人民戰爭」之「國土防空」已不適用，「攻防兼備」之空軍戰略受到廣泛的討論及注意，科索沃戰爭再次印證了空中戰力的戰略性，對中共定性「攻防兼備」具有臨門一腳的關鍵效果。1999 年 11 月，在解放軍空軍建軍 50 周年前夕，司令員劉順堯正式宣佈解放軍空軍戰略將從「國土防空」向「攻防兼備」轉變，改變了以往以「陸軍勝利爲勝利」之附屬軍種地位，確立了與陸軍平行之「夥伴關係」。空軍戰略是空軍軍力組建發展的主要依據，解放軍空軍戰略的轉變，將直接影響其建軍的進程及方向，近年來，解放軍空軍不論在武器裝備、組織編制及人員訓練，都已朝向「攻防兼備」之戰役空軍方向建設，並已獲得一定的成效，在「攻防兼備」空軍戰略的指導下，未來解放軍空軍現代化的進程將會加速，這也意味著將對區域及我國的國防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

*　　*　　*

(收件：95年6月27日，複審：95年8月8日，第二次複審：95年8月30日，接受：95年10月2日)

The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ir Force Strategy

Ren-chun Tang

Abstract

During its first few decade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ir Force strategy was primarily formulated to support the ground forces' needs. Serious changes in the way the PLAAF thought about its future began as a result of Deng Xiaoping's 1985 "strategic decision" that directed the armed forces to change from preparation for an "early, major, and nuclear war" to preparation for "local war." These changes included writing new teaching materials, conducting research on combination of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capabilities, and doing research on campaign and strategic theory. Wang Hai initiated the concept of combination of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operations in 1987, but it did not receive much publicity. Since the Gulf war, the PLAAF has been grappling with the demands of a radically changed its strategy that underscored the technological obsolescence of their armaments and so fundamentally affected the missions of the air forces that its traditional training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 were largely inapplicable to. In late 1999, the PLAAF's commander, Liu Shunyao, began to emphasize the need to fight offensive battles and declare PLAAF's strategy of combination of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operations to build 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apable of waging "local war under high-tech conditions."

Keyword: combination of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operations; national territory air defense; people's war; local war; local war under high-tech conditions

參 考 文 獻

「解放軍加強空中攻擊力」，**蘋果日報**，1999 年 11 月 8 日，第 A18 版。

「中國籌建戰略空軍」，**成報**，2004 年 6 月 28 日，http://lib-I.ndu.edu.tw/chinese/introduction_tc/online_database.htm，採自國防大學電子資料庫。

丁樹範，「中共精簡軍隊內容、性質、未來」，**中國大陸研究**，第 35 卷第 9 期（1992 年 9 月），頁 56。

上海辭書出版社編，**空軍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 年）。

天風，「中共空軍加強遠程戰力——空軍要在戰爭中擔『主角』獨立完成任務」，**廣角鏡月刊**（香港），總第 334 期（2000 年 7 月），頁 40。

王文榮主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 年）。

王定烈，**當代中國空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年）。

石之瑜，**中共外交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書局，1994 年）。

吳安家主編，**中共政權四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5 年）。

吳春秋，「淺談大戰略和國家戰略」，**世界知識**（北京），第 12 期（1984 年 12 月），頁 2。

辛明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手冊——空軍分冊**（青島：青島出版社，1991 年）。

空軍總司令部編，**空軍作戰要綱**（台北：空軍總司令部，1999 年 5 月 24 日）。

姚峻主編，**中國航空史**（鄭州：大象出版社，1998 年）。

唐仁俊，「中共對信心建立措施之立場、實踐經驗與策略運用」，**中國大陸研究**，第 47 卷第 1 期（2004 年 3 月），頁 109。

秦耀祁主編，**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概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 年）。

馬振坤，「從克勞塞維茲戰爭理論剖析中共三次對外戰爭」，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年），頁 1~27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中共軍事現代化**（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8 年 7 月）。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現代化中共軍力**（台北：史政編譯局，2004 年）。

國防部編，**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2000 年 8 月）。

國防部編，**國軍軍語辭典**（台北：國防部，1973 年）。

國防部編，**國軍軍語辭典**（台北：國防部，2000 年）。

張治昌，「空中的優勢在進攻」，**解放軍報**（北京），1994 年 10 月 14 日，第 3 版。

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台北：幼獅出版社，1996 年）。

張農科，「向攻防兼備型轉變——訪空軍司令員劉順堯中將、政委喬清晨中將」，**紫荊雜誌**（香港），總第 109 期（1999 年 11 月 5 日），頁 5~9。

陳新能，「空中力量的未來角色」，**中共戰略與戰術研究專輯**（台北：國防部，1998 年），頁 403~404。

陸文至，「鯤鵬展翅上九天——人民空軍五十年建設和發展的光輝里程」，**國防**（北京），總第 163 期（1999 年 9 月），頁 44。

華人杰、曹毅風、陳惠秀主編，**空軍學術思想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

越勇民，「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指導原則探討」，**國防大學學報**（北京），總第 114 期（1999 年 2 月），頁 24。

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台北：黎明出版社，1985 年）。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年）。

黃天中、潘錫堂，**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五南書局，1993 年）。

楊中美，「空軍司令員劉順堯」，**中共研究**，第 35 卷 10 期（2001 年 10 月），頁 119~200。

楊中美，「中共空軍戰略方針的演變形成」，**中共研究**，第 34 卷第 10 期（2000 年 10 月），頁 98。

廖文中，「中共空軍戰略及武器裝備現代化」，**中共軍事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出版，2001 年 1 月），頁 362。

廖文中，「中共空軍戰略及武器裝備現代化之概況」，**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第 187 期（2000 年 3 月），頁 32。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 年）。

劉亞樓，「在陸軍的基礎上建設空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空軍回憶史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頁 3。

劉德海，「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朝鮮半島政策與日本政策」，**國際關係學報**，第 9 期（1994 年 10 月），頁 120。

鄭文翰，**軍事辭海**（軍事綜合卷第一卷）（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年）。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

鄧小平，**鄧小平軍事文集第三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

蕭占中主編，**現代軍人素質全書**（北京：九州圖書，1999 年）。

譚傳毅，「高技術條件下解放軍之作戰指導」，發表於**跨世紀兩岸軍力發展與區域安全學術研討會**（高雄：空軍官校主辦，1999 年）。

Allen, Kenneth W., "The PLA Air Force: 1949-2002 Overview and Lessons Learned," in Laurie Burkitt,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M. Wortze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3), p. 106~107.

Allen, Kenneth W., Glenn Krumel and Jonathan D. Pollack, *China's Air Force Enters the 21st Century*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5).

Blasko, Dennis J., "Chinese Army Modernization: An Overview," *Military Review*, vol. 85,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 68.

Burles, Mark and Abram N.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0).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pril 12, 2001, as Amended through April 14,

2006).

Godwin, Paul H. B., "The PLA Face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Doctrine,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James Lilley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a's Military Faces the Future*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ess, 1999), pp. 43~48.

Harlan, Jencks,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Wishful Thinking, National Suicide, or Effective Deterr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8 (June 1984), pp. 310~315.

Lewis, John Wilson and Xue Litai, "China's Search for a Modern Air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p. 64~94.

Roy, Denny, "Restructuring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eds.,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40.